



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

荣毅仁 郭琳爽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

荣毅仁 郭琳爽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本书里彙集了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荣毅仁、郭琳爽、簡日林、湯蒂因、孙照明等人写的文章，他們詳細地叙述了自己的企业在解放前的遭遇，合营前后的变化，同时通过許多具体事例，来说明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这个政策的偉大和正确。他們还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来说明自己怎样从怀疑共产党到信任和靠攏共产党，从而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

荣毅仁 郭琳爽等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张 1 7/8 字数 38,000

1957年7月第1版

195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

統一書号：7074·155

定 价：(6) 0.17 元

封面設計：范一辛

15320

目 录

- 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荣毅仁(1)
- 党与政府教导、鼓励我前进……………郭琳爽(17)
- 一条心,一条路……………孙照明(29)
- 始终不渝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简日林(42)
- 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湯蒂因(49)

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

荣毅仁

走出校门，开始做资本家

1937年，我刚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踏进了社会。我走出校门，没有遭受到其他大学毕业生那样的命运——毕业即失业的痛苦，很快就到我父亲创办的无锡茂新第二面粉厂去做助理，并且在实际上掌管了全厂的大权。从这一年起，我就开始当起资本家来了。当时，我觉得非常得意；所以有如此的心情，倒并不是因为自己当上了资本家，而是因为从此我可以实现我的理想。

我自幼受到父亲的教诲，他老人家看到国家不断地受到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弄得国穷民困，认为只有办实业，搞经济，才能救得了国家。我是深受这种影响的。我父亲看到许多富家子弟，一到社会上做事以后，往往就挥霍浪费，出风头，搞投机，以致堕落破产，因此时常勉励我们：“我家办的纱厂、面粉厂，都是老百姓的衣食事业，你们要爱护它们。”又说：“我们老一辈创业不知经过多少艰难困苦，不知费尽多少心血；你们将来一定要克勤克俭，认真做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我在读书的时候，就鄙视纨绔子弟，立志将来好好做一番事业，当时每逢暑假、寒假，就常到茂新二厂去实习。而当我从学校毕业、走进茂新厂正式做事的时候，

就格外热爱这个企业，每天一清早就到厂，晚上七、八点钟才回家。特别是那时国难当头，更感到自己一定要按照着父亲的教诲，来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

我在茂新二厂做助理没多久，“七七”蘆溝桥事变发生了，面粉因軍需关系，售价上漲。接着，“八·一三”上海抗战，面粉更为需要。当时我們厂里生产的面粉大都是供应軍隊需要，我更認為自己为国家做了好事，我在做爱国工作；而且厂里生产足，很賺錢，心中着实欢喜。但是，上海在打仗，敌人近在咫尺，又不免觉得緊張。不久，敌机濫炸无錫，申新厂堆棉花的一个仓库，首先中彈起火，内心更觉不安。以后形势更为緊張，我不得不考虑迁家的事了。不几天，我們全家就离开了无錫。临走时，还要求留厂的职工們維持这厂，并說：局势一好轉，我就回来。其实，那时我对自己的前途如何也是茫然。

离开无錫后，我到了香港，在1938年春回到上海。当时我想：上海租界有英、美、法的势力，在租界里居住，个人安全沒有問題。那时上海租界里也有我家办的几个厂，但这些厂早有專人負責，我无法插进去，有时只好到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去閑坐；人家都有事，独我是閑着。我看到有些人对各厂負責人应酬敷衍，对自己表示冷落，使我初次尝到了失业的滋味，感到非常苦悶。

我感到老閑着也不好，就設法同几个哥哥和亲戚合資开办小布厂，后来又添上些紗錠，搞个小型紗厂，又开了昇鉄工厂。那时我們不願同日本人打交道，但为了保住这些企业，就想靠靠美国人，因此与一个美商接洽，把这些企业挂上美商牌子。受雇的兩個美国人對我們拍胸：“美国人的财产，日本人

是不敢碰的。”当时通货膨胀，物价不断上涨，厂也赚钱。我满以为倚靠美国人的势力，可以维持这些企业，战争结束时，自己可以重回茂新厂工作。不料1941年12月8日，只听得几声炮响，日本人就进了租界。靠美国人是落了空了，企业因为挂了美商的招牌，第二天，日本人就派了监督官到厂。为了不使这些自己亲手创办的企业为敌人所掠夺，我只得违反自己的意愿，去同日本人打交道，申请发还企业。

在日本人控制租界以后，通货膨胀更是厉害，投机成风，物价飞涨，我这些企业资金短绌，周转困难，常向银行借款，仰人鼻息。企业的经营也极不稳定，有时赚钱很多，有时摇摇欲坠。我们认为只有自己办银行，才能扶植实业。于是在1944年，我们兄弟又开设银行，由我兼任经理。等我一当了银行经理，人家就“刮目相看”了，有的常来问寒暖，有的也来应酬敷衍，这与1938年我刚到上海时所受到的冷遇对比，真有“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感。

那时候，从我个人来说，虽不必有求于人，但是看到国家受人控制，精神上感到非常痛苦。上海有日军的岗位，我总是绕道而过，不愿受人格上的侮辱；我每次看到报上登载敌人打胜仗的消息，就深怨国民党不争气。同时，我觉得日本所以能侵略我国，又敢于同美国开战，无非是有强大的工业，因此更加强了我振兴实业的愿望。在这一时期，我天天盼着胜利早日到来，每天晚间就偷听短波，希望听到胜利的好消息。胜利终于盼到了，在1945年8月14日晚上，我从短波中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真是兴奋非凡；全家男女老少也以为好日子终于到来了，从此中国可以由弱国一变而为强国，我们兴办

实业，也一定大有希望。因此，我就等待着国民党政府早日迁回南京，我可以立即收回茂新第二面粉厂，还可以恢复被日軍燒毀的茂新一厂。

在帝国主义、官僚資本的压榨下求生存

国民党政府回到南京时，我准备了一些資金，計劃把厂收回来，早日开工。当时，我一方面去找我离开无錫时遺弃掉的职工，商量怎样开工生产；一方面又备了公文，向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管机关申請发还茂新厂，并且亲自前去要求早一点解决。虽然他們口头上一再答允发还企业不成問題，但是一連几个月过去了，还是音訊全无，使我着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人員也实在熬不住了，便暗示我送点錢去，公文立刻可以批下来。我万万想不到要求发还被敌人占去的企业，还要拿出“运动費”。但是，为了企业能早日复工生产，减少損失，我只得照送一笔錢。果然，随着我的錢进入貪官的腰包，“准予发还”的公文也就立刻批下来了。从此，我才开始了解国民党做官的勾当，心想我們办实业的人，應該一心一意搞生产，不必过問什么“政治”。

在交涉收回茂新二厂、复工生产的同时，我积极計劃重建被日軍燒毀的茂新一厂。有一家洋行听說我要买机器，便竭力向我兜銷，非常迁就。可是在合同簽訂以后，原来“有現貨”、“可以立刻裝运”等等諾言都是一种招徠生意的騙局。經一再催促，直到1947年才运来一部分，第二年方才全部安裝完毕。

为了收回茂新二厂，我花了不少的錢和精力。那时，我認为这些都不要紧，只要厂里开工就好了。我总算盼到了茂新

面粉出厂了。可是好景不常，开工不久，就遭到了“美援”面粉傾銷的打击，我办好实业的愿望也第一次感到不太容易实现了。我在开始时还没有看清这一点。当时，善后救济总署运来大量面粉，只有少量小麦，我还天真地认为既是援助，而根据中国面粉厂设备有余、原料不足的情况，善后救济总署应该多运些小麦来让我们加工，维持我们面粉工业的生产。因此，我提出了“多运小麦，少运面粉”的建议。那里知道“美援”是假仁假义的东西，它的目的只是为了傾銷美国的剩余物资，结果，还是运来大量面粉，小麦很少运来，我的愿望落空了。

我们的纺织厂情况如何呢？抗战胜利以后，因为南洋各地需要很大数量的纱布，我国纱布出口南洋，可以获得巨额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纱厂业务很好。但是这也只是“曇花一現”。这种厚利生意，很快就被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所垂涎，国民党政府下令禁止纱布出口，各厂生产出来的纱布，只能卖给他们，由他们壟断出口，纱厂只能分得壟断利润的殘瀝。但是国民党政府还不甘心，还要棉纺织业买1,000万美元公债，我们申新一家就被攤派了100多万美元。这还不算，官僚资本还利用反动政权想出各种办法来挤垮我们。在发行伪金圆券的时候，蔣經国硬說我堂兄鴻元私套外汇，把他扣押起来，以此威胁棉纺织业按其规定的限价出售。后来按限价出售的棉纱，連棉花成本都不到；只有同官僚资本有勾结的人，才能买到便宜的限价棉纱，一般普通商人只能出黑市价格向他们轉买。经过多次的榨取，我们纱厂胜利初期获得的利润，就被搜刮殆尽。

1947年，反动政府調整外汇，物价波动非常剧烈，宋子文

要我拋售面粉，穩定市場價格。當時，我認為穩定物價是一件好事，對國家、對人民都有益處，是愛國的行動，於是就聯合了幾家面粉廠一起拋售面粉，暫時也起了一些穩定物價的作用。我很得意，宋子文也很滿意，以後他還要我和國民黨糧食部一起，做面粉供應的事。但在反動政權和官僚資本統治下的舊中國，物價畢竟是無法穩定的。我這樣做，只是上了宋子文的圈套，在客觀上當了維持四大家族統治的傀儡。不久，宋子文下了台，國民黨監察院說我舞弊，對我提出了所謂“彈劾”，並向法院起訴。因此，監察院、法院、警察局、警備司令部等反動機關，都乘機向我敲詐勒索，直到上海解放前夕，還被敲去10,000美元。我真想不到過去自以為幫助國民黨政府穩定物價是愛國行動，反而因此受罪，作了國民黨內部派系之間爭權奪利的犧牲品。

由此，我深深地体会到，在這個貪污腐敗的國民黨政府統治之下，民族工業是絕對沒有前途的，實業救國只是一種夢想；單靠克勤克儉，企業也是不可能立於不敗之地的。可以說，我對國民黨反動政權已經深惡痛絕，希望它趕快垮台。1948年底淮海戰役之後，我更看出國民黨已經崩潰，為這個反動政權的壽命即將結束而高興。但是，我希望一個什麼樣的政府呢？說老實話，我自己也不很清楚，只想有一個賢明的、廉潔的政府就好了。我對共產黨也是疑懼的。當時聽到不少謠言，說共產黨實行共產、共妻，資本家要被清算、殺頭，不殺也要去做苦工。甚至還聽說：濟南成通紗廠資本家苗海南在濟南掃街。國民黨的這些反動宣傳，更增加了我的疑懼。那時，上海工商界當中有些人到香港去了。我家也有人主張走，

他們以为在共产党的統治下，一定要吃苦头，不如帶些錢到香港，可以自由些；也有人主張不走，特別是我父亲更为坚决，他認為自己長期受外国人的欺侮，办实业就是想不受別人的欺侮，所以再也不願去仰人鼻息，同时，他又不願离开自己毕生精力所創辦的心爱的企业。他更說：“国民党政府是历史上最坏的政府，不可能再有比它坏的了。”我也不願做白华，又受到父亲的影响，也就在犹豫中决定留下来了。

这样一决定，心情倒开朗了。虽然我还没有消除对共产党的畏惧，但心想共产党来就来吧，来了之后頂多把自己的企业交出来，反正在国民党下面也是搞不好的。記得上海解放前不多时，有位友人还来同我商量到外埠办厂的事，我还劝他：“去就去，共产党来了也沒什么要紧，只要把帳目搞清楚点。”也是在解放前一个月，我在上海的住宅落成，有人劝我不必搬进去了，理由是共产党来了，还不是要搬走。我可沒有接受这番“美意”，还是搬进去了。可是搬进去沒有几天，家門口来了几百个国民党的軍隊，他們架起了机关枪，要我們搬出去。他們的目的无非是敲詐一番，我只得拿出几百銀元了事。那时我已經兼管申新紗厂的业务，每天就是在敲詐、吃官司、物价波动中弄得焦头爛額，被压得透不过气来。

跟共产党，从疑虑到靠拢

1949年5月24日夜，枪声密集，听說解放軍已經进入上海。第二天，我厂一位厂长坐了汽車来看我，說上海解放了。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解放了还能坐汽車？他告訴我：解放軍紀律很好，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我由于好奇，就同他一起坐了

汽車出去看看，一路上看到的情形，果然如他所說。一回家，我把沿途所見，告訴我的愛人。大家对生命安全是放下了心，但是对今后到底如何？企业怎么办下去？仍旧茫茫然，很是不安。

1949年6月3日，上海的党政負責人召集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談，我也接到座談會的通知，當時想：“去好呢，还是不去好？”考慮結果，認為“丑媳婦免不了要見公婆”，所以还是去了。在这个座談會上，党政首長宣布了“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經濟政策，並要求大家繼續管理企業，安心經營。還說有問題可以提出來，有困難可以請政府幫助，勞資問題可以通過勞資雙方協商解決。當時就覺得共產黨能提出這一套辦法，還不錯，但对將來實際執行怎樣，還有懷疑。我就抱着將信將疑的態度回到企業繼續經營。

說老實話，解放初期企業的困難確實是嚴重的，我的心情也因此而很不安定。那時，解放戰爭在繼續着，交通阻塞，原料供應困難，銷售都有問題；投機活動還沒有撲滅，物價仍然混亂，幣制也不穩定，再加上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以及國民黨飛機的濫施轟炸，要維持紗廠、面粉廠，確實是很困難的。這時，工人在生活上又提出了一些要求，更覺得非常吃力。我也耽心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能不能办好經濟。當時，我只有把企業的实际困難向華東紡管局、貿易部、人民銀行等機關反映，請求幫助解決。並且，為了克服困難，我也主動提出了不少解決困難的辦法，如供應原料、收購、定貨、加工、包銷、貸款等等。凡是我提出的辦法，只要對生產有利，能夠維持生產、渡過困難的，政府總是迅速的同意照辦，從沒有受到過留難。這是我過去從來沒有碰到過的事情，使我感到很快慰。更使我興

奋的是，在 1949 年底，人民政府就大力取締投机活动，并从而稳定了物价。这又是一个大“奇迹”。这使我不得不开始信服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了，感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办法，是实事求是的，說得到，做得到，同时感到自己过去 10 多年未能实现的办好实业的理想现在是可能实现了。从此，我开始認識了共产党，靠攏人民政府。于是，在推銷 1950 年人民胜利折实公債的时候，我代表荣氏各企业認購了 12 万份公債，表示我以 12 万分的热情来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1950 年 5 月，我以特邀代表的身份，代表上海工商界参加中央稅务會議和列席全国政协第二次會議。在政协开会时，有一件事是我終身难忘的。那是在开会前夜的一次宴会上，我第一次会見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当时的心情一方面很高兴能見到国家的最高領袖，同时又在猜想着国家最高領袖一定非常严肃可畏，恐怕难得亲近。可是，当我見到毛主席的时候，他第一句話就开玩笑地說：“啊，荣先生，你是大資本家呀！”周总理也打趣地称我是“少壯派”。国家领导人員这种亲切和藹和无拘无束的态度，又增加了我对共产党的認識。在政协會議之前，我还参加了全国稅务會議。当我第一个发言的时候，当时财政部薄一波部長，听不懂我的口音，几次要我講的慢一点，以便把我的意見記下来，我一面感到有点难为情，一面又深深地为领导干部这种謙虛和認真的作风所感动。可是在这次會議上，对若干問題的爭执很多，上海的代表們也提了不少意見。当时有一个地区的稅务局長認为，国家如此照顧上海的私营工商业，上海工商界意見还这样多，真不應該。我听了很不舒服，立即插嘴說：“政府邀請我們来，原是要听我們的意

見。如果認為我們意見太多不好，那麼我們可以不提。”薄部長聽見了，就再三鼓勵我們要多發表意見，說人民政府的事是大家商量辦事的，批評了那位局長，對我的態度也提了意見。今天回想起來，當時能積極提出意見，固然是好的，但也應該說，那時提意見的出發點大半還是為了私營工商業的利益，沒有考慮到國家的利益。這兩次會議給我的教育是極為深刻的，它使我在思想上縮短了同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距離。會後我覺得，以後光講做生意是不行了，還要多懂些道理。我回到上海，就和朋友們一起，選擇了“七一”黨的生日那一天，成立了學習組織，學習國家的政策和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想只有學懂一些政策和理論，才能好好地跟共產黨走。

在那個時候，對於共產黨，只是感到它在政治、軍事、經濟上都很有辦法，特別對它有好感的是它能幫助私營工商業克服困難，維持生產，從而以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辦實業大有可為。但是也有些問題，常常使自己不安寧，比如在公私關係上、勞資問題上，有些地方同自己想的有抵觸，因此往往引起爭執。當我看到私營工商業的蓬勃發展就很高興。那時，我認為是新民主主義，國營經濟固然要發展，它對國家和人民有好处，但覺得私營經濟也應該同國營經濟“平行發展，各得其所”，這樣也沒有什麼坏处。也就是，我思想上只是維護資本主義的利益，希望新民主主義“長存”、“萬歲”，而並不希望社會主義到來。

兩次嚴重的考驗

正當我們一心一意發展經濟的時候，突然抗美援朝運動

开始了。这个运动开始时，我确实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我恨帝国主义，特别恨美帝国主义，因为我曾经吃过它不少苦头，但对它也仍然有些幻想，觉得我们国家应当励精图治，大力进行经济建设，何必惹是生非，多耗军费，影响建设，何况美国将来对我国建设或许有所帮助。不多久，中国人民志愿军过了鸭绿江，捷报频传，把美国侵略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我才感到新中国如今确实是大不相同了，我们祖国确实站起来了。百年来常受外人欺侮压迫的民族，居然打败了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这一伟大胜利，激发了我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就在上海市工商界抗美援朝示威大游行的那一天，我热情地参加了游行，擎着大旗，迎着大风，从南京路外滩一直坚持到西藏路人民公园。这是我生平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以后我又积极投入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同全国人民一起，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神圣斗争。

随着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工商界出现了不少问题，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等等不法行为都发生了。1952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伟大的“五反”斗争。在开始的时候，我也认为这些不法行为确实不好，应该反掉。但是后来斗争到自己头上来了，心里很不痛快，以为自己这几年来一直靠攏党，做事也规规矩矩，没有犯什么错误，为什么也要“反”？又怀疑政策是不是在改变？记得我当时还对一位朋友说：“今天的政府很有办法，只要国家能够兴盛，我们个人牺牲一点也算不了什么。”这意思就是，如果

政府真的不要我們这批資本家，只要国家强，个人如何也就不去考虑了。斗争终究是苦痛的，我一面又要检查自己，一面又要安定各个企业负责人的情绪，精神上又紧张又苦闷。但经过“五反”运动之后，我倒很感谢这次运动了。因为，“五反”粉碎了我的“新民主主义万岁”的念头，使我认识到这种想法是极其危险的。在“五反”中揭发出来的许多具体事例，也使我认识到资本家的不良行为，如果不加以打击，任其滋长下去的话，势必会破坏国家建设，影响人民生活。因此，资本家只有老老实实地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对国家、对自己才有益处。

在消沉、苦闷中摸索道路

“五反”虽然反掉了我的旧的想法，但是新的思想却还没有树立起来，因此感觉到很苦闷，很消沉。经过“五反”运动之后，国家和人民还是把我们当做一家人，信任我们，在那一年夏天，我出席了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扩大会议，路过苏联时，还亲身感受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我以后还被选为全国和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然而，我们资本家的前途究竟怎么样？出路究竟何在呢？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萦回着。

在苦闷当中，为使这些问题求得解答，我想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中去找找看，因此在这一时期中，我就埋头自学。我看了“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主义基础”和毛主席的著作等等，阅读了这些经典著作，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我思想上的问题，但也启发了我对于立场、观点的一些认识，并且对我以后的工作很有帮助。

前途究竟如何？那还是在总路綫提出以后才明确的。1953年7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討論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綫，提出了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指出資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具体道路就是通过国家資本主义的形式。接着，全国工商联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又深入地討論了私营工商业在过渡时期总路綫中如何发挥积极作用的問題，使我对本身的地位、前途和具体任务，有了进一步的認識。这在我真有說不出的开心。在政协常委会上，我发言說：“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更是‘人心所向’，这个‘人心’同样包括了我們工商界的心。”道路的明确給我以莫大的鼓舞，但回想起来，說得更深刻些，那时个人的思想感情还没有完全同社会主义結合起来，这最根本的原因是自己还没有完全剝开資本主义丑惡的一面来看一看，还没有去正視剝削的事实。

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1955年8月，申新系統的企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各厂的全体职工和資方都以无比兴奋的热情来欢庆这件大喜事。政府派了公方代表与私方代表共同組成了公私合营筹备委员会。职工們热情更高，在不影响生产的原則下，組織力量，清点了企业的全部财产，清出了許多过去我們不清楚的财产，并公平合理地核定了私股股金。对原有私方实职人員，都根据各人的能力和資历，进行了适当的安排，我仍担任了公私合营申新棉紡織印染厂总管理处总經理的职务。企业合营后，无数的事实使我更加認識到社会主义經營管理的优越性。象